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科学的真理

——读《孙子》

罗焕章

孙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据说他的前代本是田氏（即陈氏）家族，赐姓孙氏。鲍、高、国三氏代表齐国统治集团内的保守复辟势力向田氏进步势力进攻，孙武在齐国立不住足，因此奔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孙武在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入吴；阖闾接受他，并任用为将，是由于伍子胥的推荐（《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今本《孙子》十三篇，孙武入吴前已经写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比孔丘徒弟子徒孙炮制的《论语》几乎要早一个世纪（《论语》公元前428年以后出笼，见章炳麟《左氏疑义答问》卷一）。

孙武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日趋没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势不可挡的时代。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夺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涤荡着奴隶制社会的污泥浊水，已形成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局势。毛主席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春秋末期的战争愈来愈剧烈，正是那种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作为一个进步的军事家孙武，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培育出来的。

齐国是法家前辈管仲辅佐齐桓公建成霸业的东海之滨的一个大国。管仲之后，“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孙武生活的齐景公时代，执掌政权的田氏，坚持管仲路线。“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史记·齐太公世家》）。田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以田代姜，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田氏族人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被晏婴推荐带兵反击晋、燕的侵犯，立了大功，“尊为大司马”（《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的政治军事活动给田氏推行新政，实行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大造了声势。代表保守、倒退的鲍、高、国奴隶主贵族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散布谣言，使司马穰苴抑郁而死（《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孙武奔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参预了齐国政治军事上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接受了司马穰苴的思想影响。而当时又是奴隶起义烈火燃遍各地的时代，鲁国柳下跖、楚国庄跻领导的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奴隶主闻风丧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孙武在这样火热的阶级斗争现实中，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写出了科学的军事名著——《孙子》。

它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以下《孙子》引文，只注篇名）的战争规律，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进行武装斗争赢得胜利的重要军事理论和批判儒家反动军事思想的锐利武器。《孙子》从出世以来，就广泛地受到重视。韩非指出，“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著名法家曹操也充分肯定《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序》）。这是对《孙子》所作的公允评价。

“知彼知己”的思想，是孙武军事理论的核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儒法两家在作战的指导思想方面是根本对立的。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面临奄奄一息行将灭亡的绝境，他们是不愿知道客观世界的现实，也不敢接触主观世界的。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只好把天命观作为精神武器，搬神弄鬼，把战争的胜败问题，归之于上天安排，用唯心主义来掩盖其虚弱的反动的本质，支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孙武坚决反对天命论。他从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和社会实践教育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战争中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才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孙武对当时错综复杂的战争规律的高度概括，是他在社会实践中能动的反映客观世界的结果。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因为要想正确地指挥战争，必须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使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才能下定正确的决心，夺得战争的胜利。“知己知彼”，在战争中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指出：“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孙武也认为，必须既知彼，又知己，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他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地形》）。孙武批判了儒家在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指出他们是“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用间》）。强调“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孙武极端重视战前的“先知”，重视对战争胜败的客观条件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在孙武看来，这个“先知”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将帅头脑以外的一切客观事物都应该是“知”的对象。他说：“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地形》）。在这里，首先是对敌方情况的了解。他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素知之”（《用间》），就是要事先掌握敌方的人事情况。与此同时，还要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他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就是说，要进行多方侦察，必要时甚至可以进行试探性的战斗，即今之所谓“火力侦察”，一定要弄清敌人兵力配置情况。其次，还要了解地形的情况。孙武认为，对于作战来说，地形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列入“知”的范围。他说：“不知山林、

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九地》）。并强调指出：“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总之，孙武认为：“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只有在掌握敌情、我情、气候、地形等多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才能下定决心，同心协力，出敌不意，去夺取战争的胜利。

怎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孙武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就是说不能求神问鬼，不能以事类推，不能主观揣测，只能进行调查研究，依靠人的作用去取得必需的资料。在这里，孙武既反对了客观唯心主义，也反对了主观唯心主义，表现了这个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哲学思想上朝气蓬勃的唯物主义精神。孙武这些思想，不但有力地批判了儒家的“死生有命”，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天命”的唯心主义观点；同时，对林彪所谓战争的胜负全靠什么“一念之差或一念之对”，完全否定在战争问题上的调查研究的反动谬论，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奇正迭用，变化无形”（《北堂书抄》卷一一三引傅玄《古今画赞·孙武》）是孙武含有辩证法内容的军事思想。这种思想是从“知彼知己”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引申出来的。客观事物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着、变化着和发展着的。战争是千变万化的。孙武用朴素辩证法的观点认识战争问题，对战役战术提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从自然界的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出发，论述了符合辩证法的作战原则。他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这里的“因敌变化而取胜”，就是辩证法的观点。孙武还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势》）？他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这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把事物的变化发展又片面地说成是“终而复始”，“死而复生”，“循环之无端”，则是错误的。

孙武强调奇正相变，对敌我的强弱、众寡、生死、存亡、虚实、动静、治乱、攻守、奇正、胜败等对立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矛盾是互相转化的、弱可以胜强、寡可以敌众的理性认识。他说：“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就是说每次打仗都不能重复老一套办法，而要根据情况变化，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圜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势》）。就是说在战争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造成有利的态势，象把圆的木头和石头从险峻的山上滚下来一样，势不可挡。孙武还认为，有了“势”，还必须有“节”（节奏），他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

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彀弩，节如发机”（《势》）。所谓“节”，就是看准火候，抓住机会，象凶猛的鸷鸟抓小鸟一样。孙子认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要善于造成险峻的气势，导演出短促而有力的活剧。这就是箭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气势和节奏。所谓“奇正相变”，都需要掌握好“势”、“节”，而且“势”、“节”相配。指挥员创造了这样的有力态势，就可以夺取战争的胜利。

声东击西，制造假象，也是“奇正相变”原则的应用。孙武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认为指挥战争要用诡诈的办法制造假象去蒙蔽敌人，不可以事先机械地规定什么框框。“诡道”就是灵活而富有变化的作战原则。孙武强调“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军争》）。说明打仗用兵就是要用迷惑敌人的办法来隐蔽自己的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毛主席肯定孙武这一作战原则，指出：

“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毛主席又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林彪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指挥原则，大搞形而上学，提出什么“六个战术原则”，作为万古不变的教条，强迫人们去信奉。这就充分证明了他自吹的所谓“军事辩证法”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军事唯心论”。

从“奇正相变”的原则中，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要善于调动敌人，迫使敌人疲于奔命，直至被消灭。孙武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做到“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这里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要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怎样才能调动敌人呢？孙武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要对敌人采取“利诱”和“攻害”的办法，使它轻举妄动，疲劳沮丧；然后“以治待乱，以静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军争》）。“治心”“治力”都是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有效办法，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予不意的攻击，使敌人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失措的困境，促其丧失优势和主动，陷入被动挨打的泥坑。“诡道”、“错觉”的目的在于争取战争的主动权，牵着敌人鼻子走，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从变化发展的辩证观点来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

避实击虚，以弱胜强，也是从“知彼知己”产生出来的辩证法战术。孙武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虚实》）。水往低处流，打仗象水流一样要避实而击虚。孙武解释“避实击虚”说：“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壕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虚实》）。就是说“进”、“退”、“攻”、“守”都要注意避实击虚，一定要掌握住敌军的变化情况，或防御或进攻，有进有退。孙武说：“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毛主席指出：“孙子说的‘避其锐气，

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孙武特别强调“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军争》）。就是避开敌人的锋芒，拣弱的打，减杀敌人的优势，化其优势为劣势，这是军事上的重要原则。

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也必须从“知彼知己”出发，来决定战术。孙武说：“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出其不意地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造成敌人的混乱，使它扶东倒西，被动挨打。趁敌人手忙脚乱之时，“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虚实》）。打得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九地》），彻底被消灭。孙武还认为，攻其不备的行动必须迅速。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在战术上要速决。要善于“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军争》）。做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对敌人采取出其不意的攻击，消灭敌人。

从“知彼知己”出发，孙武的“奇正相变”战术，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兵力歼灭战的辩证法思想。进攻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只有执行正确而周密的战略战术，才能达到全歼的目的。孙武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谋攻》）。这主要是讲的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同时说明了要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力求消灭敌人的力量。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孙子》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孙武认为：“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虚实》），主张“以众击寡”，务求全歼。这对于在战争中彻底消灭奴隶主阶级的武装势力，保存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力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达到“全歼”的目的，必须“速决”。孙武说：“兵贵速，不贵久”（《作战》），“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军争》）。行军要隐蔽，作战要神速，乘敌之隙，突然进退，四面包围，速战速决。这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敌人的重要军事思想，它和林彪叫嚷的“猛冲、猛打、猛追”，“要特别发挥冒险精神”，“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拥上去就好”，“不顾伤亡多大”“就是要打莽撞仗”的荒谬言论，迥然不同。林彪在军事上不讲“避实击虚”、“声东击西”、“诱敌深入”、“以佚待劳”等基本原则，象疯子一样乱撞乱碰，叫喊“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主张打莽撞战，消耗战，这实际上是妄图用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来掩盖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

孙武在军事上强调“知彼知己”，但并不忽视正确的政治路线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他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把“道”摆在决定胜负的首要的、统帅一切的地位。他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孙武这里讲的道和法，实际上就是正确的政治路线即法治路线，就是要以法治军。他还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计》）。就是要把推翻腐朽的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的政治主张灌输到人民中去，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为战争出力。孙武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借用或利用人民的力量；只有实行符合历史发

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能“令民与上同意”，使人民支持战争，组成一支宏大的军队，造成“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形》）的局面，怒潮澎湃，势无可挡，压倒腐朽的敌人。

孙武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虽然旗帜鲜明地站在法家路线一边，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去研究战争问题，总结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科学真理，但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其历史观不可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主要地表现在他对将领、人民、士兵的态度上。他虽然提出“令民与上同意”，但无视人民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把战争的胜负看成取决于少数将领的指挥技能技巧。特别是把调动士兵作战，称为“若驱群羊而往”（《九地》），更是露骨的反动观点。他在战略思想上，只讲战略进攻，不讲战略防御；只讲战略速决，不讲战略持久，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片面性。同时，他主张“围师必阙，穷寇勿追”（《军争》）也是错误的，反映了他的妥协性。实际上，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军事家，由于他们阶级的局限，根本不可能完全作到“知彼知己”，因而也就不可能“百战不殆”。即使熟读孙子兵法，对“知彼知己”有深刻研究的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就打了败仗。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能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因而也就能“百战不殆”地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勇前进！

更正：本刊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复辟与反复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文作者之一“肖健生”应为肖健全。